



I N T E R E S T I N G
T I M E S

A Twentieth-Century Life

霍布斯鲍姆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
周全◎译

自传

趣味横生的20世纪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INTERESTING 霍布斯鲍姆自传
TIMES 趣味横生的20世纪
A Twentieth-Century Life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
周全◎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霍布斯鲍姆自传：趣味横生的 20 世纪 / (英) 霍布斯鲍姆著；周全译. —2 版.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

书名原文：Interesting Times: A Twentieth-Century Life

ISBN 978-7-5086-5319-8

I. ①霍… II. ①霍… ②周… III. ①霍布斯鲍姆，E. (1917~2012) - 传记 IV. ① K835.61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2418 号

INTERSTING TIMES by Eric Hobsbawm

Original copyright © Eric Hobsbawm, 2002

Interesting Times © Bruce Hunter and Christopher Wrigley, 2002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霍布斯鲍姆自传：趣味横生的 20 世纪

著 者：[英] 艾瑞克 · 霍布斯鲍姆

译 者：周 全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版 次：2016 年 1 月第 2 版

京权图字：01-2009-1478

书 号：ISBN 978-7-5086-5319-8 / K · 473

定 价：68.00 元

印 张：17 字 数：500 千字

印 次：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自序

自传作者必须也是自传读者。我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诧异，原来我所认识的人里面，已有许多男男女女出版了关于自己生平的作品。更遑论那些通常来说较为杰出或臭名昭彰的人士，早就有别人捉刀帮他们著书立传了。我甚至还没有把许多当代人物所写的、以小说形式加以包装、实则自传的那些著作计算进来。或许我不应该惊讶才对。反正以写作与沟通为业的人，总是习惯和同类打交道。况且各种文章、访谈、印刷品、录音带甚或录像带，以及与本书相似的著作当中，有惊人的数量是由任教于大学的男男女女所完成的。可见我并非特例。

尽管如此，有个问题仍值得思考。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写出自传？更要紧的是，为什么那些与我并无特别关系，甚至在书店看见本书封面以前根本不晓得我的人，会想花心思来阅读它？伦敦的书店当中，至少有一家连锁书店在“传记”这个类别下面，又特别将某些人纳入一个称作“人物”（Personalities）的小类别。套用今天的行话，那叫作“名流”（Celebrities），而我无缘名列其间——“名流”也就是那些不论基于何种理由而闻名遐迩的人士，并且正是他们的名气才使得公众对其生平产生了好奇心。我也不属于那些有过参与公共事务的经历，故而得以将自传称作“回忆录”的人。那一类的人物通常不论男女，都在公共舞台上涉足颇深，有许多事迹需要记载下来或加以辩护；要不然就是他们与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关系密切，甚至他们所做的决定影响了重大事件的发展。但我从来就不是其中的一员。

或许我的名字会被列入一两个专业领域的历史著作，像是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相关史料集，或者出现于某些讨论 20 世纪英国知识文化界的书籍里面。除此之外，纵使我的名字因为某种理由而完全消失不见，

一如我父母在维也纳中央公墓的墓碑一般（五年前我曾费心寻觅却无结果），以 20 世纪为主题的论述也不致出现明显缺漏——无论在英国或其他地方皆如此。

另外，这本书并不是以当前销路甚广的“忏悔录”风格来撰写的，原因之一是只有天才才有资格自说自话，而我既非圣奥古斯丁，也不是卢梭。另一个理由则为，每当自传作者开诚布公地谈论其他在世者的隐私时，难免会以不恰当的方式伤害到某些人的感情。我没有理由要这么做，因为那属于死后才出版的传记，而非自传所该做的事情。无论如何，不管我们对那些事情再怎么好奇，历史学家不是传播流言蜚语的专栏作家。将军们的战功并非依据他们在床上做了什么事（或做不了什么事）来判断的。所有想从凯恩斯和熊彼特二人多姿多彩的性生活来推断其经济学理论的尝试，终将归于失败。而且我猜想那些喜爱阅读风流韵事传记的读者，将会发现我的生活是多么令他们失望。

本书也不是打算为作者的生平提出辩解而写的。如果你不想真正了解 20 世纪，可以去阅读那些替自己做出解释、帮自己“出庭辩护”的人所写的自传；或者亦可反其道而行，阅读那些幡然悔改者所写的自传。这些类型的著作都好比是法庭进行验尸的时候，由死者来冒充验尸官一般。一位知识分子的自传必须涉及他自己的理念、态度与作为，而非只是一份自我宣传的东西。我相信这本书多少回答了新闻记者和其他人士经常向我提出的问题。令他们感兴趣的是一个不大寻常的案例——一位终生不渝却非典型的共产主义者，亦即“霍布斯鲍姆这位马克思派的历史学家”。然而我的目的并不在于向他们做出答复。历史可以评判我的政治信念（它其实已经大致做出了断语），读者们可以评判我的书籍。我所追寻的则是对历史的认知，而非打算得到同意、认可或同情。

尽管如此，除了出于人类对别人的好奇心之外，这本书或许还有其他值得被阅读的理由。我的人生经历几乎完全涵盖了人类历史上最奇特也最可怕的世纪。我在好几个国家生活过，并且目睹了三大洲许多其他国家的

事物。或许我在漫长的一生当中并未留下任何显赫成就（我倒是在纸上留下了不少书面记录），但由于我在 16 岁时便立志当历史学家，我亲眼目睹并亲耳听闻了其间大多数的事件，并设法了解我这个时代的历史。

当我撰写完毕从 18 世纪末叶至 1914 年之间的世界历史以后，终于着手探讨我所称的《极端的年代：短暂的 20 世纪》。¹ 我认为这项工作的优势在于，我不仅以学者的身份进行写作，同时也是人类学家所谓的“亲身参与的观察者”。而这表现于两方面：我个人对那些发生于遥远时空的事件之各种回忆，有助于让年轻读者更加贴近 20 世纪的历史，同时我的叙述也再次唤醒年长读者本身的回忆。尽管我必须严格遵守史学研究的要求，但比起我的其他著作，那本书甚至是以更大的热情——正是属于极端年代的那种热情——来撰写的，不论是年轻的读者还是年长的读者都曾经如此告诉过我。除此之外，那本书试图以较为深刻的方式，展现个人生活与所处时代之间的相互交织；我希望对个人生活与所处时代的同时观察能有助于形塑一种超脱于两者的历史分析。

这也是一本自传所能做到的事情。就某种意义而言，本书是《极端的年代》的对照面；但所依据的并非是从单一个人经验来阐释世界的历史，而是世界的历史正在形塑个人的经验——更恰当的说法或许是，历史不断提供一组变化多端但又总是有所限制的选择机会。从这些选择机会里，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或许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按照围绕在他们周遭的世界来创造人生。

就另外一种意义来说，历史学家的自传是他或她自己研究工作里重要的一环。除了对理性的信仰以及辨别事实与虚构的能力以外，自知之明——从自身的内在和外在进行观察——也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从业者所需要的一项技能，特别是像我这种凭着直觉随机挑选各种研究主题，最后才将它们整合成为具有前后一贯整体性的历史学者。其他历史学家

们或许只在意我书中那些较专业的层面。不过我希望其他人阅读本书的时候，能够把它当作一本入门书，通过一段不可能发生于其他世纪的个人人生旅程，来认识世界史上最特殊的一个世纪。

正如我的同事，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²所言：“历史著作是由外部来观察已发生的事件，而自传则是从内在来进行观察。”这本书没有一般学术著作惯用的那种致谢词，而只是纯粹表达感谢和歉意。最需要感谢的人，莫过于我的太太马琳（Marlene）。她陪伴我度过人生大半岁月，阅读了全书的每一个章节，并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她的丈夫因为努力将过去的事件撰写成书，往往心不在焉、脾气暴躁，有时还灰心丧气，并且生活在古代的时候远比现代来得多；而这一切她都长年累月容忍承受了下来。我也要感谢斯图尔特·普洛菲特³这位编辑界的泰斗。这些年来，我曾经向许多人请教过与这本自传有关的问题；其中有几位在我开始动笔之后已相继去世，由于他们的人数过于庞大，以致无法一一列出致谢，但他们都应该知道我表示感谢的理由。

我还必须向马琳和我的家人说一声抱歉。本书很可能并不是他们原本所想要的那种自传。尽管自从他们进入我的人生，以及我进入他们人生的那一刻开始，他们都一直在我心中。但这本书所谈论的大多还是公众的生活，而非个人的私生活。我当然也应该向那些不曾出现于书中的朋友、同事、学生等人致歉——他们原本或许期待会在这里看见自己的事迹，或是以较长的篇幅被谈论。

最后，我将本书安排成三个部分。在一篇简短的绪论之后，第1章到第16章大致是以编年纪事的顺序，来讨论关于我个人及政治的事件。所涵盖的时间范围从我有记忆开始（即20世纪20年代初期），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但我无意将之写成直线前进式的编年史。第17和18章叙述我的专业历史学者生涯。第19章到第22章所谈论的，则是那些与我的人生长期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或地区（我自己的中欧和英国故乡除外），包括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

区以及美国。这个部分的章节由于涵盖了我和那些国家的全部互动关系，以致无法轻易纳入本书的编年叙事主轴当中，即便它们与主轴略有重合之处。因此我认为最好还是将这些内容单独成章。

伦敦，2002年4月

译注

1. 霍布斯鲍姆将19世纪称作“漫长的19世纪”（1789—1914），将20世纪称作“短暂的20世纪”（1914—1991）。前者从法国大革命一直持续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者则从“一战”爆发延续至苏联解体。

2. 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1929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为犹太裔匈牙利女哲学家。她从1986年开始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

3. 斯图尔特·普洛菲特（Stuart Proffitt）是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部主任，被视为当代英国最优秀的政论书籍编辑。

目 录

自序	V
----	---

第一部分

第 1 章 楔子	002
第 2 章 维也纳的童年时光	011
第 3 章 艰难时期	037
第 4 章 柏林：魏玛共和灭亡	058
第 5 章 柏林：褐色与红色	085
第 6 章 在英伦岛	105
第 7 章 剑桥	132
第 8 章 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	150
第 9 章 身为共产党员	168
第 10 章 大战	201
第 11 章 冷战	227
第 12 章 斯大林与后斯大林时代	258

第 13 章	分水岭	286
第 14 章	克尼赫特山下	302
第 15 章	20 世纪 60 年代	319
第 16 章	政治观察者	343

第二部分

第 17 章	与历史学家为伍	366
第 18 章	在地球村	385

第三部分

第 19 章	马赛曲	406
第 20 章	从佛朗哥到贝卢斯科尼	435
第 21 章	第三世界	465
第 22 章	从罗斯福到布什	495
第 23 章	尾声	524

第一部分

1994 年秋，我正任教于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我的妻子马琳则留在伦敦处理信函。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表示收到一封来自汉堡的信函，但那是用德文写的，所以她看不懂。发信人署名“梅莉塔”，这封信需要转寄给我吗？我在汉堡并无熟人，但我毫不迟疑地立刻知道是谁写信过来，虽然我已将近四分之三个世纪没见过那位署名人了。那只能是维也纳索伊特别墅（Seutter Villa）的小莉塔——她实际上只比我大一岁左右——写来的。结果证明我是对的。

她在信中写到，无意间在德国自由派知识分子阅读的《时代周报》上面看见了我的名字。她立刻推断，我一定是很久很久以前跟她们姐妹一起玩耍的那个艾瑞克。她翻遍自己的相簿，找到了随函附上的那张照片。照片中五个小朋友和他们各自的保姆一起站在别墅露天阶梯看台上，小女孩们头上都戴着花环，或许连我也戴了吧。那五个小孩分别是莉塔、她的妹妹鲁思和伊娃（我们习惯称之为“彼得”的苏西当时尚未出生），以及我和我的妹妹南希。她的父亲在照片背面写下了时间：1922 年。莉塔还询问起南希的近况如何。但她怎么可能晓得，小我三岁半的南希早已过世好些年了呢？！我上次去维也纳的时候，造访了我们从前住过的房子，并拍下一些照片送给南希。当时我还以为，能够共享索伊特别墅生活回忆的人只剩下了她而已。现在往事却重新历历在目。

我也有那张照片。辗转传到我手中的家族相簿里面（我是家中唯一还健在的人，父母和妹妹均已过世），这张来自索伊特别墅的快照是我生平的第二份图像记录，同时是舍妹南希的第一张照片——她于 1920 年生

于维也纳。我在自己的第一张照片中还是小婴儿，躺卧在一个用柳条编成的巨大婴儿车内，身旁没有大人或其他可供辨认的事物。我猜想那张照片应该拍摄于亚历山大港（我在1917年6月出生于该地），以便请当地英国领事馆的职员为我办理出生登记——然而登记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们不但把日期搞混，就连姓氏也拼错了。¹几个不同的英国外交单位分别主管了我母亲的婚事，还承蒙外交大臣格雷爵士亲笔签署特许状。他允许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臣民利奥波德·珀西·霍布斯鲍姆，迎娶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臣民妮莉·格林为妻，而当时两国正处于交战状态。从两国之间冲突的角度来说，我未来的父亲表现出了病态的爱国主义情操，我未来的母亲则对其嗤之以鼻。1915年时英国尚未引进征兵制，但母亲已经明确告诉父亲，万一英国实施征兵制的话，他必须正式登记为“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①我真巴不得批准他们婚事的人，就是汤姆·斯托帕德《谐谑剧》里面的那位领事主角。²我也非常期待，当他们在苏黎世等待格雷爵士放下手头紧迫的工作、拨冗处理其婚礼相关事宜的时候，能够顺便结识当时也待在同一座城市的流亡者，像列宁、乔伊斯，或者哪位创立达达主义的艺术家的。可惜他们俩看来未曾有过那样的际遇，而且几乎可确定的是，他们在当时情况下对结识那些人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显然更关心自己即将前往卢加诺度蜜月一事。

假如年方18岁的格林小姐，维也纳一个家境尚可的珠宝商三位千金之一，未曾和一个较年长的英国男子——他在他家的八名子女中排行第四，其父为移民至伦敦的犹太裔家具木工——于1913年在亚历山大港相恋的话，我的人生将是何模样呢？格林小姐很可能会嫁给一名来自中欧的中产阶级犹太青年，她未来的小孩则是奥地利人。由于几乎所有年轻奥地利犹太人的最后下场都是移居国外或成为难民，我接下来的人生应该不至于差别很大——那些人多半也都前往英国，在此地上大学并成为

① 本段及以下几段叙述参考了家母1915年5月写给其姐妹的信件。

学者。但是我将不可能在英国长大成人，更不可能持英国护照来到英国。

我的父母亲无法生活在交战中的英国或奥匈帝国，因而途经罗马和那不勒斯返回亚历山大港。那里是他们最早相遇的地方，也是他们在两国开战前定下婚约的所在。他们都各自有亲戚住在该地：我母亲的舅舅艾伯特在当地开设了一家“新奇百货店”（我还有一张那家商店和员工的照片）；我父亲的哥哥厄尼斯特则替埃及邮政电报局工作，而我便使用了他的名字。³（由于每个人的私人生活都是历史学家和小说家的素材，我曾将父母亲相识的经过写入我的历史著作，用于导出《帝国的年代》一书之内容。）

战争才刚结束，他们就立刻带着两岁大的儿子移居维也纳。这正是为什么尽管官方资料把我一辈子跟埃及绑在一起，它却不属于我人生一部分的原因。或许除了努扎（Nouzha）动物园关在笼中的小鸟，以及应该是一位希腊裔保姆哼唱过的走调儿歌之外，我对埃及没有丝毫印象和记忆。我从未动过念头打算一探自己出生地的究竟，只晓得那一带叫作体育俱乐部，位于亚历山大市中心通往拉姆勒（Ramleh）的电车路线上。但依据福斯特⁴的记载——他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和我父母亲待在亚历山大港——当地没什么值得谈论的事物。他所撰写的《亚历山大港：历史与旅行指南》一书中，对体育俱乐部有轨电车站的全部描述只是：“邻近赛马场大看台，左侧为海水浴场”。

因此，埃及并不属于我人生的一环。我不晓得生命中的记忆始于何时，但大部分的记忆都无法回溯到两岁时的光景。自从搭乘“赫鲁安”号轮船离开亚历山大港驶往的里雅斯特以后，我就未曾再去过那里。的里雅斯特当时刚被奥地利割让给意大利，但我已经记不得我们抵达时的任何情况了。无论如何，那里是各种语言和种族汇聚之处，城内到处是咖啡馆，船长多如过江之鲫，而且保险业巨擘爵能拉理保险公司的总部也设于此地——该公司的商业帝国很可能就对“中欧”这个概念做出了最佳诠释。80年以后，我在的里雅斯特当地朋友们陪伴下，有机会实地

探访这座城市。那些朋友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克劳迪欧·马格利斯⁵这位不凡人物；他让人重新回味起中欧风情，以及认识了那个交融糅合日耳曼、意大利、斯拉夫和匈牙利文化的亚德里亚海角落。我的外祖父当年曾来此与我们会合，然后陪我们搭乘南方铁路的火车前往维也纳。维也纳从此成为我展开有意识生命的地点。我们起先与外祖父母共住了几个月，父母亲则利用那段时间寻找自己的公寓。

父亲初抵维也纳的时候，手头存有“硬通货”——当时没有任何货币会比英镑来得强势。在这个货币不断贬值到几乎崩盘的贫困国度，他充满了自信，而且相形之下还颇为富裕。索伊特别墅似乎正是理想的居家选择，它也是我生命中第一个让我感觉是“我们自己的”地方。

任何搭乘火车从西方进入维也纳的人，现在仍会经过索伊特别墅。当火车驶近维也纳西郊的许特多夫-哈金车站时，如果你从右手边的窗户向外张望，就会看到那栋傲然耸立于山腰的宽阔建筑物，以及其厚实高塔之上的四边形圆顶。它是在弗朗茨·约瑟夫皇帝（1848—1916）执政后期，由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所兴建的。其范围向下延伸至奥霍夫街，那条马路则顺着昔日皇家狩猎场——莱因策动物园——的围墙往西延伸，然后与一条狭窄的上坡路交会（它那时名叫文岑茨-赫斯巷，现在则称作索伊特巷）。街道的尽头当时还只是一排用茅草搭盖的农舍。

我童年记忆中的索伊特别墅，大半是“Hobsbaum”一家大小共享的那个部分（不管亚历山大港领事馆的职员搞出了什么名堂，那才是我们姓氏的正确拼法）。霍布斯鲍姆家租下了别墅二楼的一间公寓，戈尔德（Gold）一家人则承租我们楼下底层的公寓。我对那里的记忆，主要就是以屋旁的露天阶梯为中心，因为两家人不同世代之间的社交活动大都于此进行。有一条现在回想起来相当陡峭的小径，从这个阶梯看台通往最底下的几座网球场（它们上面现在已经盖了房子）。途中会经过一棵小男孩眼中的大树，但它的枝条其实低得可供我们攀爬。我记得曾向一个小男孩展示过大树的秘密，而他是从德国某个叫作雷克林豪森的地方转

来我们学校就读的。我们被要求好好照顾他，因为他原来生活的地方已经陷入困境。除了那棵树和他的家乡——今日位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我对他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他很快就回去了。虽然我还并不晓得此事的意义，但它确实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 20 世纪重大历史事件。那个事件就是法国在 1923 年占领了鲁尔区，而暂时被送离危险家园、由奥地利善心人士予以照料的众多孩童之一，便成为我接触此事件的渠道。（当时全体奥地利人都自视为德国人，要不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制定和约的一方予以否决，他们早就投票同意加入德国了。）

我至今仍印象鲜明地记得，当初我们如何在楼下某个铺满干草的马厩嬉戏。可是当我上一次和马琳一起访问维也纳的时候，我们虽曾在别墅里里外外仔细搜寻过，还是无法在马厩原来可能所在的位置发现任何东西。说来也奇怪，我对索伊特别墅屋内的事物缺乏记忆，只是隐约记得它既不很明亮，也不很舒适。除了还记得天花板或许很高之外，我完全想不起我们家和戈尔德家公寓内的任何事情。

五个（稍后变成六个）学龄前的儿童——或顶多只是小学低年级生——同在一个园子里玩耍，这是维系两个家庭互动关系的最佳黏合剂。霍布斯鲍姆和戈尔德两家人相处融洽，尽管二者的家世背景大不相同，因为“戈尔德”虽然看起来像是犹太名字，但他们似乎并非犹太人。无论如何，他们继续留在奥地利欣欣向荣，换句话说，那是在希特勒合并奥地利之后的“大德意志国”。戈尔德先生和太太都来自锡格哈茨基兴，下奥地利州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戈尔德先生是该地唯一客栈老板兼农场主人的儿子，戈尔德太太则是村中唯一商店（从袜子到农耕用具都卖）店主的女儿。两家人与故乡的联系非常紧密。他们在 20 世纪 20 年代家境已经相当宽裕，足以请人为自己绘制肖像。我眼前就摆着一幅复制的黑白双人画像——大约一年以前，仍在世的两位戈尔德女孩之一把它寄给了我。画像上那位相貌严肃、身穿深色日常便服、衣领浆得挺直的绅士，实在无法唤起我的任何回忆。当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确实

未曾与他有过亲密接触，虽然他曾经向我展示自己在帝国瓦解之前戴过的军官帽，而且他是我所知道唯一真正去过美国的人（他去那里是为了谈生意）。他那边带了一张留声机唱片回来，而今天我可以确认那首曲子叫作“花生小贩”。除此之外，他还透露当地有一家名叫别克的汽车制造商，但我基于说不出来的理由并不相信会有这种名字。⁶

在另一方面，画中那位貌美而脖子修长、短发向两侧波浪起伏，以神色端庄但不十分自若的目光，搭配袒露的肩膀来观察世界的女士，立刻又栩栩如生地浮现于我的心头。这是因为妈妈们更为频繁地出现于幼儿的生活中。我的母亲妮莉天资聪颖，见过国际世面，并受过教育；而安娜·戈尔德（我们称她为“安琪”）在学校待过的时间不长，对自己的乡下背景始终难以释怀。但她们很快就成为最要好的朋友，而且终其一生未曾改变。依据安娜之女梅莉塔的讲法，妮莉果真是她母亲唯一的闺中密友。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纵使霍布斯鲍姆家族早已不为戈尔德后代子孙所知晓，其照片仍出现于戈尔德夫妇住在维也纳的外孙所保留的家庭相簿中。一位戈尔德家的女孩以几乎和我同样鲜明的方式回忆起，她如何陪伴自己的母亲于家母在世最后几天内前往探病。当时“安琪”哭着对她说：“以后我们再也看不到妮莉了。”

两个几乎和“短暂的20世纪”一样老迈的人，就这样一起展开了人生，然后在上个世纪既离奇又可怕的世界中，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因此我回顾这漫长一生的时候，以一张照片意外勾起的回忆作为楔子。那张照片同时出现于两个家庭的相簿中，但那两家人缺乏共通之处，唯一的例外是他们的生活曾在20世纪20年代短暂交会于维也纳。在此共同分享儿时回忆的人，一个是退休的大学教授和云游四海的历史学者，另一个是退休的女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兼职翻译人，（她对此的说法是：“就跟令堂一样！”）但这些仅仅是两位当事者感兴趣的私事。即便如此，那些回忆也只不过细如游丝，串起了70年之间的广阔时空。其间的人生完全分离、互不关联、不知对方去向，甚至未曾有过一刻想起